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十四辑

• 古诗卷 •

學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十四辑·古诗卷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14辑·古诗卷 / 赵敏俐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77-4677-8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6487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20 1/16 开本

印 张: 28.5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孙晓娅 姚苏杰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编 务：马富丽

本期编辑：史 文 刘 玲 燕丽红

张 彬 李 飞

目录

[台湾地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专题]

视角的差异

——20 世纪有关谢灵运年谱传记观点之研究 ◇陶玉璞 \1

六朝僧人山水诗与“观照”一词的相互交涉关系 ◇李姿莹 \23

刘禹锡以诗文为“见志之具”的理念与实践 ◇李尧涓 \40

从读者到作者：论清代女诗人的学诗历程 ◇王怡云 \52

[吟诵专题]

楚辞吟咏研究 ◇华 锋 \63

传统读书艺术——吟诵 ◇魏嘉瓚 \73

苏州弹词与格律诗的吟诵 ◇程毅中 \88

2012 ~ 2014 年出版的吟诵著作简介 ◇刘奶景 \95

[论文索引与摘要]

2011 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 ◇张彬 燕丽红整理 \99

2011 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硕士论文索引 ◇李飞整理 \206

2011 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 ◇李飞整理 \252

[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报刊所见诗话书录 ◇傅宇斌 \327

近三十年吴伟业诗女性书写研究综述 ◇马思聪 \348

《周礼·春官宗伯》研究综述 ◇王霄蛟\357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诗经》农事诗研究 ◇崔 冶\371

[书评]

“名正”言顺 新见迭出

——评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 ◇何江波\381

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的开拓之作

——评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

◇闫运利\384

域外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学

——也谈《剑桥中国文学史》 ◇侯 敏\387

致力于解开唐诗密码的创新之作

——评王志清先生《唐诗十家精讲》 ◇吴振华 黄金灿\394

王辉斌先生的李白研究

——以其《李白研究新探》为评论的中心 ◇吴振华\399

[学人志]

曹旭教授\407

方铭教授\416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动态]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425

《中国诗歌通史》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426

第四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427

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429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2013 年度工作总结 ◇赵敏俐\432

视角的差异

——20 世纪有关谢灵运年谱传记观点之研究

◇陶玉璞

一、前言

年谱的编撰，《汉书·艺文志》载有《古来帝王年谱》五卷^①。但该谱影响不大，甚至至唐代均未再出现类似文献。欧阳修（1007～1072）《新五代史》则有《十国世家年谱》，然其形式则类似《史记》以来之年表，由此猜测，《古来帝王年谱》亦当是同类形式之文献。不过，《宋史·艺文志》则记载了各种年谱，由此可知年谱乃是宋人开展的新形式文献，其或又称为年表，但与《史记》之年表不同，不能因编年形式而随意混为一谈。然而，相对于陶渊明（约 365～427）、韩愈（768～825）等人年谱于宋代已陆续着手编撰考订，谢灵运年谱则迟至 20 世纪方才出现。至于传记，虽然历代史书皆有，不过，如李商隐（812～825）《李长吉小传》五卷、李焘（1115～1184）《陶潜新传》三卷……这种独自刊行之别传，我们也是迟至 20 世纪方才真正的看见《谢灵运传》。由此可知，20 世纪乃是谢灵运年谱及传记从无到有的转折期，而就在这个关键点，研究者视角之差异便特别重要，研究者当然不能忽略其对谢灵运研究所造成的影响。

二、谢灵运年谱、谢灵运传记于 20 世纪的编纂

20 世纪共编纂有九种谢灵运年谱：叶瑛（1896～1950）《谢灵运年谱》（1924，以下简称《叶谱》）、丁陶庵（～1925～）《谢康乐年谱》（1925，以下简称《丁谱》）、汤用彤（1893～1964）《谢灵运事迹

^① 参见《卷 30·艺文志·术数略/历谱》，第 1766 页。

年表》(1932, 以下简称《汤谱》)、郝立权(1895 ~ 1978)《谢康乐年谱》(1935, 以下简称《郝前谱》)、郝昺衡(1895 ~ 1978)《谢灵运年谱》(1957, 以下简称《郝后谱》)、杨勇(1929 ~ 2008)《谢灵运年谱》(1970, 以下简称《杨谱》)、船津富彦(1915 ~)《谢灵运年谱》(1983, 以下简称《船津谱》)、顾绍柏(1938 ~)《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1987, 以下简称《顾谱》)、李运富(1957 ~)《谢灵运年事简谱》(1999, 以下简称《李谱》)^①。如果数据的编纂常态是“后出转精”的话^②, 就谢灵运年谱而言, 倒不是一定如此。譬如:《杨谱》数据详赡, 但其后《船津谱》则又极度简略;《顾谱》考证繁细, 但其后《李谱》却仅是删减改写《顾谱》而成, 甚至作者于文前还要求读者“查看顾先生《系年》”。如果读者以为谢灵运年谱的编纂常态像钟摆般左右摇晃、详简不定, 倒也不是那么单纯。譬如:黄节(1873 ~ 1935)的弟子郝立权初有《郝前谱》, 改名郝昺衡后又纂成《郝后谱》, 二谱相差了二十二年;虽然后谱是在前谱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 但所增数据颇多, 篇幅也增加了将近初谱的二分之一, 实为“后出转精”的典型例证。综合而观, 20 世纪这九种谢灵运年谱便展现出来饶富趣味的问题意识, 我们自然不能忽视这批研究谢灵运的基

① 叶瑛《谢灵运年谱》, 收入《谢灵运文学》,《学衡》1924 年第 33 期(1924 年 9 月)。

丁陶庵《谢康乐年谱》,《京报·文学周刊》(1925 年 10 月 17 日)。

汤用彤《谢灵运事迹年表》, 收入《竺道生与涅槃学》,《国学季刊》1932 年第 3 卷 1 号。后收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8 年;上海:上海书店, 1991 年《民国丛书》三编, 册 10)。

郝立权《谢康乐年谱》,《齐大季刊》, 1935 年第 6 期。

郝昺衡《谢灵运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1957 年第 3 期。

杨勇《谢灵运年谱》, 收入《饶宗颐教授南游赠别论文集》(饶宗颐教授南游赠别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1970 年)。

船津富彦《谢灵运年谱》, 收入《山水诗人——谢灵运》, 东京:集英社, 1983 年, 第 234 ~ 238 页;《山水诗人——谢灵运传记》, 谭继山编译, 台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第 215 ~ 218 页。

顾绍柏《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 收入《谢灵运集校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台北:里仁书局, 附录 2, 第 381 ~ 453 页。

李运富《谢灵运年事简谱》, 收入《谢灵运集》, 长沙:岳麓书社, 1999 年, 附录 2, 第 421 ~ 435 页。

② “后出转精”一语, 引自顾绍柏《谢灵运年谱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家》, 1987 年 5 期(总 7 期, 1987 年 9 月 25 日)。不敢掠美, 特此注记。

础资料。

20 世纪所编撰之谢灵运传记，其荦荦大者，约有七种。最早有叶笑雪（～1934～）《谢灵运传》（1957，以下简称《叶传》），其后则有小尾郊一（1913～2004）《谢灵运传》（1973，以下简称《小尾传稿》）^①。小西升（1915～）《谢灵运山水诗考——自然素材的选择与审美意识》（1976）于说明谢灵运永嘉时期二十余首诗时，为了减少繁杂的说明，便设注释云：

叶笑雪选注《谢灵运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最后所附《谢灵运传》是目前最详细、最正确的谢灵运传记，可资参考。^②

虽说是“最详细、最正确”，但衡诸当时所见，除了刊载于学报且不完整的《小尾传稿》，实未见其他的出版品，故舍此则将难以以其他文献替代了。其后，则有林文月（1933～）《谢灵运》（1977，以下简称《林传》）、船津富彦《山水诗人——谢灵运》（1983，以下简称《船津传》）、沈玉成（1932～1995）《谢灵运》（1983，以下简称《沈传》）、小尾郊一《谢灵运——孤独の山水诗人》（1983，以下简称《小尾全传》）、李森南（1919～2005）《山水诗人谢灵运》（1989，以下简称《李传》）^③等五种。其中，《林传》一书是为了配合《古风丛书》的

① 叶笑雪《谢灵运传》，收入《谢灵运诗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43～220页。

小尾郊一《谢灵运》，参见《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0卷、31卷1号、32卷1号（1971年3月、1972年1月、1973年1月20日）。

② 参见《福岡教育大学纪要》26（1976年）。宋红译，见《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谢灵运研究丛书》册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注9。

③ 林文月《谢灵运》，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7年；台北：国家出版社，1982年。

沈玉成《谢灵运》，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1，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429～440页。

小尾郊一《谢灵运——孤独の山水诗人》，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

李森南《山水诗人谢灵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按：小尾郊一《谢灵运》、《谢灵运——孤独の山水诗人》，前者仅撰写至谢灵运永初三年尚未至永嘉任太守时期；今就已出刊之文字、内容来比较，二者只有些微差异，前者因不全而简称为《小尾传稿》，后者则简称为《小尾全传》，以资区别。

第一辑十种古代文学家传记出版而撰写，由于以青少年为主销读者，文字比较浅白；《船津传》则是为了配合《中国の诗人》传记丛书而成，全书遂以“诗”作为章节的结构主轴。

粗略而观，1983年接连出版了三种谢灵运传记，不容否认，当然是丰收的一年。或许事有凑巧，但其中也存在着细腻的人为操作痕迹：首先，《沈传》乃是配合“文学家评传”而写，篇幅不能太多，而该书恰巧于该年出版。而船津富彦、小尾郊一这两位日本学者之所以在同一出版社同时出版两种谢灵运传记，若要了解其前因后果，读者当从《中国の诗人》十二册传记来切入思考：盖《中国の诗人》传记丛书乃是一般性的读本，比较偏于介绍性质，故出版社汲古书院便从日本十二所大学各安排一位学者来着手撰写^①，而小尾郊一便选择了《飘逸诗人——李白》（1982），其着眼点不外乎诗仙李白（701～762）于中国诗歌的代表地位，而且已于前一年出版了；于此，其旧作《谢灵运传》（《小尾传稿》）不适合这套丛书的品位，遂改写成学术性较强的《谢灵运——孤独の山水诗人》一书，而又恰好同年出版。

由于书籍接受者的设定不同，船津富彦、小尾郊一二人便特意将全书结构进行不一样的安排：船津富彦从“诗的基础”（诗の基盤）、“诗的特质”、“诗与生活”、“诗后话”（诗をめぐむ余話）层层叙写，传记部分置于《谢灵运的诗与生活》这一章中；小尾郊一则将传记部分置于《前编·谢灵运的生涯》，《后编·歌颂山水诗》（山水をうたう詩）则突显谢灵运的山水诗人身份与特征。着实而言，除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书名，船津富彦该书的章节安排确实无法让一般大众读者领会传主的山水诗人身份，而此缺憾则适时地由小尾郊一填补了。

倘若将谢灵运年谱、谢灵运传记视作两类文献而分别进行比较，虽可看出这两类文献的发展，但读者实在很难理解其“为什么不是依着进步、进化的道路直线进行，反倒是迂回前进”的原因。盖这十六种文献并不是完全单独存在，例如：《叶谱》、《汤谱》乃是附于论文之后，以便读者对照参考，以简单清楚为目标；《顾谱》、《李谱》乃是附于谢灵运集之后，前者认为有必要将细节清楚呈现出来，以便读者对

^① 只有一本例外，《豪放诗人——韩退之》，其作者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野直彬、东京大学助手斋藤茂同时列名。

照而仔细体会谢灵运为何如此撰写诗文，后者则因前者所具典范性，遂仅删减改写而方便读者对照而已。至于《船津谱》乃是《船津传》三种《附录》之一^①，目的也是方便读者对照；了解了原因，读者亦比较能够体会其所以如此简略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杨谱》、《李传》，由于杨勇、李森南二人本是温州人（原名永嘉），血液中本即无法抹去阐扬乡里先贤的责任与使命，如此，便无怪乎杨勇该谱之所以如此详赡，而李森南虽早已退休而年届古稀，其又为何坚持完成该书了。反观谢灵运，其担任永嘉太守不过一年，且“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见《宋书》本传），任官当时，大概也未能预料后世对其是如此尊崇的吧！

三、谢灵运年谱、谢灵运传记的视角差异

就谢灵运年谱、谢灵运传记而论，早就出现论述专文，如顾绍柏《谢灵运年谱中的几个问题》（1986）及《谢灵运生平及作品系年的几个问题》（1993）二文，指出了编纂谢灵运年谱易碰到的几个难解问题；进入21世纪，又有宋红（1957～）《谢灵运年谱考辨》（2001）一篇，对谢灵运年谱进行思考与反省^②。既有专文，现在便以此三文点出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来思考其视角的差异。综合三文，我们试将有关谢灵运之事，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 谢灵运何时撰写《撰征赋》？
2. 是《谢封康乐侯表》，还是《谢封康乐公表》？
3. 谢灵运何时因杀桂兴而免官？王弘哪一年弹奏谢灵运？
4. 谢灵运《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应系在哪一年？
5. 谢灵运何时撰写《辨宗论》？何时在石壁建招提精舍？

以上五个问题，并不是三篇文章的全部问题，其间也掺杂了笔者自己的思考，但其之所以成为问题，即在于各年谱的不同系年。今试以此五问题来思考前述这十六种年谱及传记的视角差异。

① 按：中译本删去了《谢灵运关系地图》、《后记》（あとがき）两部分。

② 顾绍柏《谢灵运生平及作品系年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3年2期。
宋红，《谢灵运年谱考辨》，《文学遗产》，2001年1期。

1. 谢灵运何时撰写《撰征赋》？

《宋书》本传收录了《撰征赋》全文，由此可知沈约（441～513）对于谢灵运该文的重视。然而，其“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一语，过于简略，实在无法告诉读者明确的时间。关于此，试简略的整理成四种不同的时间差异：

(1) 义熙十二年（416）：《叶谱》、《丁谱》、《沈传》。

(2) 义熙十三年（417）：《郝前谱》、《郝后谱》、《顾谱》、《李谱》。

(3) 义熙十四年（418）：《杨谱》、《林传》、《船津谱》、《李传》（误作《征赋》）。

(4) 元熙元年（419）：《叶传》、《小尾传稿》、《船津传》、《小尾全传》。

《撰征赋》撰写时间最易引起误会者，即在于本传所谓“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且赋中又有“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治兵于京畿，次师于汭上”之语，此皆是将该赋系于义熙十二年的主要原因。不过，揆诸该赋内文又有“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之句，遂将该赋改系于义熙十三年；此亦为《郝前谱》、《郝后谱》本系于十二年，而笔者认为其文意为十三年之原因。然而，虽说原文为“仲冬就行”，但自《叶传》即疑“仲冬”为“仲秋”之误，且该赋又有“相国宋公，得一居贞”之文，对照刘裕（363～422）于义熙十四年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故又有义熙十四年之说。至此，如果将“奉使慰劳”系于义熙十四年，再加上“分春反命”，则该赋只有系于元熙元年（419）一途了，此当即为《叶传》、《船津传》的观点。此中，最为有荒谬者为《船津传》及《船津谱》，既然《传》与《谱》可前后对照，其前后却又各自系于不同的时间，实在让人莫衷一是。

究其实，从“分春反命”之语而观，笔者认为：《撰征赋》便只有义熙十三年、元熙元年两种选择。余者，便只有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了！盖“相国宋公……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的时间顺序，即不合理；如果“相国宋公”指义熙十四年六月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其后便不应再有“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之文。除非“相国宋公”四字另有他意！于此，我们姑且让文献自己来呈现。义熙十二年十月，刘裕进兵洛阳，围金墉，修复晋五陵，置守卫，天子诏曰：

……其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綬绶。^①

既然晋安帝已经下诏，在谢灵运眼中，“相国”、“宋公”之号，自是当之无愧。如此，《撰征赋》自可系于义熙十三年！于此，我们反倒必须证明其为何不适合系于元熙元年了。

至此，我们姑且再一次让文献自己来呈现。《晋书》云：

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初讖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使王韶之继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云。^②

“昌明”，孝武帝司马曜（362～396）之字。由于讖语明指“昌明之后有二帝”，为了篡位，刘裕遂毒杀晋安帝以凑数，以求尽速达成篡位的目的。倘若《撰征赋》系于元熙元年，这篇讴歌刘裕的赋文，便又增加了助纣为虐的味道。此视角的差异，失之毫厘，差之何止千里！

2. 谢灵运何时杀桂兴？王弘哪一年弹奏谢灵运？

谢灵运杀桂兴（？～419）事，《宋书》本传未明写，仅云“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盖沈约为其讳之故也。其事之详，则在该书《王弘传》：

宋国初建，迁尚书仆射领选，太守如故。奏弹谢灵运曰：“……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谿，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显居要任，邦之司直，风声噂沓，曾不弹举。……”^③

从王弘（379～432）之奏文，读者可知其大概情形。另外，我

① 参见《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第38页。

② 参见《卷10·安帝纪》，第267页。

③ 参见《宋书·卷42》，第1312页。

们又可以从该书《王准之传》知道王准之（378～433）亦曾受此事牵连：

王准之……坐世子右卫率谢灵运杀人不举免官。^①

由于谢灵运杀桂兴事“播闻遐迩”，《南史》亦摘要其事：

……宋国建……奏弹世子左卫率谢灵运，为军人桂兴淫其嬖妾，灵运杀兴弃尸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弹举。……^②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便会发现桂兴的身份——门生、力人、军人——实在差异太大，完全无法理解^③。幸好，虽不是细枝末节，但这个问题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谢灵运的理解。不过，该事应该系于何年，则不应模糊以对。关于此，试将年谱、传记整理如下：

(1) 义熙十二年（416）：《叶谱》。

(2) 义熙十四年（418）：《沈传》、《船津传》。

(3) 元熙元年（419）：《郝后谱》、《叶传》、《杨谱》、《小尾传稿》、《船津谱》、《小尾全传》、《顾谱》、《李传》、《李谱》。

(4) 永初元年（420）：《郝前谱》、《林传》。

(5) 义熙十二年～元熙元年（416～419）：《丁谱》。

此中，最容易被排除者当是《郝前谱》、《林传》；盖因其二者大概是将“宋国初建”与“刘裕即帝位”混为一谈，致使把谢灵运传中最负面的事情系于永初元年。

至于《叶谱》之所以将此事系于义熙十二年，主要是依据《宋书》本传将此事紧接于《撰征赋》全文之后，故叶瑛遂将二事同时系于义熙十二年；由此可知，《宋书》本传于此事之叙述方式易引起误会。

① 参见《宋书·卷60》，第1624页。

② 参见《卷21·王弘传》，第569页。

③ 《沈传》于此，曾特别注释：“……在魏晋南北朝，门生的地位很低，接近于部曲佃客，《晋书·王机传》即以‘奴客、门人’并提。本传复记谢灵运‘奴僮既众，门生、义故数百，可以为证。’参见页435，注2。

按：此说自有道理，但笔者仍未见‘门生、力人、军人’并举者，故云完全无法理解。

近似于《叶谱》而囿于《宋书》本传者，则为《丁谱》，观其内文，我们自可见丁陶庵的推论方式：

……惟本传继云：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不知是在此年，抑以下何年耳。

由于“本传继云”四字，故系于义熙十二年；然而，“不知是在此年，抑以下何年耳”一语，实说明了其疑虑。故于元熙元年下，又云：

……则本传云：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杀门生免官，虽难考定何年，然至迟当在此年之前也。

盖刘裕于元熙二年六月即位，改元永初元年。因本传于“杀门生免官”之后，紧接“高祖受命”之语，故丁陶庵因此认为“至迟当在此年（指元熙元年）之前也”。而近似于《丁谱》者，则为《沈传》。其云：

……义熙十四年……本传说他“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也应当是本年或稍后的事情。

由于“世子左卫率”乃谢灵运杀门生所免之官职，于此，对谢灵运杀门生事，沈玉成也只能保守地说“当是本年或稍后的事情”。

由《丁谱》、《沈传》来看，就是因为《宋书》本传于“杀门生免官”事过于简略，只能提供一个大概范畴，无法给读者确定的年份。虽然《沈传》比《丁谱》缩小了范围，但读者应该还是不会满意的。

《船津传》、《船津谱》的系年情形比较特别：分别系于义熙十四年与元熙元年。虽然此举与前文所举其对《撰征赋》的荒谬系年方式雷同，但笔者认为还是必须探讨其观点。《船津传》云：

……在《晋书》的《谢玄传》中有：“元熙中，为刘裕世子左卫率。”……

《宋书》本传记载：“坐辄杀门生免官”。……关于这件事，《宋书》的《王弘传》有详细的记载。在义熙十四年六月，刘裕成

为宋公，王弘担任尚书仆射之后，立刻揭穿谢灵运的罪状。……^①

船津富彦所以有此两种不同的系年，很可能是因为可以有谢灵运、王弘两种不同的切入点：如以谢灵运为主要切入点，王弘奏文作“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而谢灵运担任世子左卫率则在元熙年间，而元熙元年十二月，“进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②，所以王弘弹奏的时间只有一个选择——元熙元年，而此亦可能为多数年谱、传记系于此年的主要缘故；若以王弘为主要切入点，王弘弹奏时任尚书仆射，而其任此尚书仆射即在义熙十四年六月刘裕“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之后，故由此便可推论出义熙十四年。就是因为如此，致使《船津传》、《船津谱》会有不同的系年。

既然谢灵运免官于元熙元年，不用说，谢灵运杀桂兴的最晚时间当在此年。而最早的时间又在何时？于此，世子左卫率只能作为谢灵运被弹奏时的官职，但不必然是其犯案时的职位。其犯案之时间，或可从王准之任御史中丞一职来查考。《宋书·王准之传》云：

王准之……宋台建，除御史中丞，为僚友所惮。准之父讷之、祖临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职。……^③

由于王准之任御史中丞，其对于谢灵运杀桂兴事方负有弹奏之职责；由此可知，该事必在王准之任御史中丞之后，而义熙十四年六月即是谢灵运杀桂兴最早的可能时间。顾绍柏《谢灵运生平及作品系年的几个问题》一文于此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

……王弘奏词云：“杀兴江谿，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灵运确在京师作案，而不在彭城。

透过《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一诗，我们只能知道谢灵运九月已至彭城；而《彭城宫中直感岁暮》一诗则是其于彭城过年的明

① “元熙中”，《晋书》原作“永熙中”。参见《卷79·谢玄传》，第2806页。按：《船津传》日文版即作“元熙中”。为免误会，特此注记。

② 参见《宋书·卷2 武帝本纪/中》，第45页。

③ 参见《卷60·王准之传》，第1624页。

证。但是，似乎仍缺其赴彭城的时间。《顾谱》猜测“六月……谢灵运、谢瞻当于是时应刘裕之召，赴彭城任职。……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若真如其所说，则谢灵运杀桂兴事自然也在元熙元年了。

“杀人”实为谢灵运传记中最不光彩的事情，沈约讳言该事，我们只能透过“互见”笔法来展现这段不名誉史实。不过，我们还是要探讨谢灵运如此冲动而杀人的心理。宏观而论，这段时间最有名的“杀人”新闻，应该不是谢灵运杀桂兴事，反倒应是晋安帝遭酖毒事件。《晋书·安帝纪》记载其时间：

十二月戊寅，帝崩于东堂，时年三十七。葬休平陵。^①

戊寅，当是十二月十七日。于此，我们便比较能够深入地了解谢灵运《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中“晚暮非独己，鸣鳧歇春兰”句的深意了。而《顾谱》为《岁暮》诗系年时，又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义熙十二年……岁末：时灵运仍在彭城。……似与作于义熙十四年末的《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属同一情调，然并非同一首，故暂系于是年。

着实而言，不仅“诗属同一情调”，《岁暮》中“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诸句，比《彭城宫中直感岁暮》更是悲伤、更是传神。套一句刘鹗（1857～1909）《老残游记》的名言：若非经历帝王遭毒杀的心理冲击，哪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哀”字写得好呢？

由于谢灵运现存两首《岁暮》诗，而其又于义熙十二、十四年在彭城过了两次年，顾绍柏遂将两首诗平均分配成各一首。于此，笔者认为二诗系年不必如此机械僵硬，盖“明月照积雪”十日某一个亮度高的渐亏凸月，可能就是因为晋安帝遭毒杀的信息传到了彭城，让谢灵运伤心的“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久久无法入眠，且愈至深夜，愈是悲哀！虽然“杀人”不是好事，但比起晋安帝遭毒杀，谢灵

^① 参见《晋书·卷10》，第267页。